

“白马驿之祸”：压倒大唐最后一根稻草？

□晨报记者 吕登纬 文/图

唐天佑二年(公元905年),浚县古黄河畔发生了一起震惊朝野的屠杀惨案。当年6月,左仆射(yè)裴枢、清海军节度使独孤损、右仆射崔远、吏部尚书陆贽(yì)、工部尚书王溥、兵部侍郎王赞等30余名显官名士被一日诛尽,投尸黄河。经此一变,天下哗然,早已风雨飘摇的大唐王朝彻底丧失了统治根基。而这场屠杀惨案的始作俑者、当时的“梁王”朱温更是在两年后彻底废掉唐哀帝,自立为帝,开创“后梁”。

因这场惨案发生在浚县境内的白马驿,因此被称为“白马驿之祸”。“白马驿之祸”被后人视为唐王朝的丧钟而备受关注和研究。鲜为人知的是,影响中国走向千余年的门阀制度也至此而终。6月29日,记者来到浚县善堂镇寻找“白马驿之祸”的事发地,探究此案的始末。

骇人听闻的“白马驿之祸”

晚唐时局风雨飘摇,裘甫、庞勋、王仙芝、黄巢率领的农民起义军纷纷登上历史舞台,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击着大厦将倾的唐王朝,朱温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生的。后来,年纪轻轻的朱温加入了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。

中和二年(公元882年),朱温判断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即将失势,便率部降唐。唐僖宗喜爱朱温骁勇,赐名“全忠”,委朱温以重任。

在灭掉黄巢等多支起义军后朱温已掌握了唐王朝的核心武装力量,权倾朝野。天佑元年(公元904年),为了进一步掌握朝局,朱温杀掉唐昭宗,立昭宗13岁的儿子李祝(chù)为帝,史称唐哀帝。

为了进一步铲除异己,朱温采纳幕僚李振的建议,决心打击朝中门阀士族把持的文官集团。天佑二年,朱温以皇帝

的名义,召集仆射、吏部尚书、工部尚书、兵部尚书等30余名高级官员到位于浚县的白马驿议事。裴枢、独孤损、崔远等文官怎么也想不到,原定的会场成为了屠杀场,30余名高级官员被一日之内斩尽杀绝。

作为帮凶的李振目睹了血腥的场面但不解气,便对朱温说:“此辈尝自言清流,可投之(黄)河,使为浊流也。”《新五代史》中记载:“太祖(朱温)笑而从之。”这便是震惊天下的“白马驿之祸”。

在接下来的几天里,朱温又连续将朝中数百位出身显赫的官员污蔑为朋党,随之尽数诛戮,朝中士大夫为之一空。“白马驿之祸”为朱温图谋篡夺唐政权扫清了最终障碍,不久其废掉唐哀帝,加冕为帝,改元开平,定国号梁,史称“后梁”。

历史上的白马驿应位于浚县

我国驿站的发端或可追溯至商代,到了秦汉时期已形成了一整套驿传制度。隋唐时期我国驿传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,唐代的官邮系统以京城长安为中心向四方辐射,驿路四通八达。据《大唐六典》记载,全盛时期的唐王朝拥有驿站1600余座,专门从事事务的人员有2万余人,白马驿正是众多驿站中的一座。

记者查阅多个版本的《浚县志》,均未发现书内对白马驿具体位置的记载。虽然大量史料描述白马驿位于滑州、黎阳一带,且根据当时的局势和朱温的势力范围来判断,白马驿在今浚县及滑县交界处显得合情合理,遗憾的是并未有文献直接交代白马驿具体位置或大致方位。

记者在浚县东部地区采访时了解到,在善堂镇与“白马”二字相关的地名有多个,如浚县依山街道角场营村附近的四女台遗址。据浚县文保部门考证,此遗址正是始建于战国时期的黄河古渡口——白马津。

《史记正义》记载:“白马津在滑域白马县北三十里。”据此反推,四女台遗址东南15公里正是滑县的白马墙村。2009年,安阳市考古队曾对该村进行过细致地勘察、钻探,发现该村保留有城墙、城门、古墓葬及面积庞大的古城遗址,据考证这里正是白马古城。

另外,在善堂镇马村,还有一座高十几米、百米见方的小土丘。虽然该土丘貌不惊人,但当地村民相传,此地便是

赫赫有名的白马山,也叫白马坡,汉代末年关羽便是在此击败袁绍手下名将颜良的。

记者在马村及附近区域走访时了解到,马村的白马山无人不晓,如今白马山上仍留存有始建于清代的关帝庙,马村村东还曾发掘出颜良的墓穴。

这些带有“白马”烙印的古遗址如一颗颗珍珠在黄河故道畔连接成串。根据史书中关于朱温将“白马清流”尸体投河的记载,记者判断白马驿应毗邻古黄河。但是,茫茫黄河故道在浚县、滑县绵延百里,白马驿故址究竟在哪儿呢?

我市文史爱好者张宗乾介绍,白马驿虽然具体位置未被大多数史书记载,《浚县志》也未对其具体位置进行过表述,但滑县地方志中有交代。

张宗乾说,通过查阅资料,他了解到民国二十一年,王蒲园等学者曾编修过《重修滑县志》,该书对白马驿的记载“蜻蜓点水”,难能可贵的是书中对白马驿的位置进行了交代:“唐时白马旧驿,向在城北白马坡,迎阳铺即其旧址。”了解到这些,记者心中的困惑迎刃而解。

“铺”字在《辞海》收录的诸多词意中有驿站之意。顾炎武所著《日知录·驿传》一书中表述:“今时十里一铺,设卒以递公文。”由此可见,无论是白马驿还是迎阳铺,均为驿站之所在。1950年,迎阳铺所在区域划归浚县管辖,这座发生过诸多传奇往事的千年古驿如今还归浚县管辖。

“白马清流”为何被沉尸黄河

“清流即清澈的流水,古时还将道德高尚的儒士比作清流。”张宗乾介绍,与清流相对应的是浊流,清浊难以共融,这也是裴枢等30余名高官惨死后为何被投尸黄河的真正原因。

张宗乾介绍,朱温在策划“白马驿之祸”前实际上已经控制了朝局,他之所以仍然对裴枢等人发难除了其残酷的秉性外,也是他有意打击裴枢等人背后庞大的门阀士族。

门阀士族萌生于两汉,发展于魏晋,兴盛于南北朝与隋唐时期。门阀士族通过察举、征辟官吏、门生故吏密切关系,这样这些影响力庞大的世家大族互相结亲,逐渐形成盘根错节的政治集团。门阀士族通过选拔官员等方式获取权势,诸如以陇西李氏、赵郡李氏、博陵崔氏为代表的“七宗五姓”,其子孙和门人往往能左右朝局,撼动皇权。

“裴枢出身河东裴氏,这个家族在唐代诞生了17名宰相。崔远出身博陵崔氏,《新唐书》赞博陵崔氏为‘天下推士族之冠’,其余大部分官员也多出身门阀士族或为门阀士族的门生故吏,身份显赫。”张宗乾说,这些自诩为清流的人上人在大唐盛世时期自然是高不可攀,但时逢乱世,他们的名誉及门第出身却为他们招来了杀身之祸。

“学而优则仕”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基本信条,尤其是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建立,从根本上肯定了知识分子成功的渠道。

然而,到了晚唐时期政治动荡、科举昏暗,作品入选《全唐诗》的晚唐诗人,如李群玉、李洞、陆龟蒙、罗隐、刘得仁等才子大多终身不第,悔恨一生。

造成大量才子落榜的根本原因,一方面是“其进士大抵千人,得第者百一二”,即当时进士名额较少,“桂树只生三十枝”;另一方面便是取仕不乏门户之见,若非出自门阀士族,寒门学子大多“鬓毛如雪心如死,犹作长安下第人”。

“成功就是清流,不成功便是浊流。”张宗乾说,落榜文人手无缚鸡之力,荫封、荐举、征辟等人仕途径自然与其无缘。为了实现人生抱负,他们大多填充藩镇的府邸,成为军阀的幕僚,因怀揣着科场失利的遗憾及对门阀士族的怨恨,报复的欲望越发强烈。

“正因如此,李振等依附朱温的幕僚才会说出‘此辈尝自言清流,可投之(黄)河,使为浊流也’这样怨毒的话来泄愤。”张宗乾认为。

“白马驿之祸”沉重打击了大唐王朝,朱温更是自此开始了对门阀士族的铲除,存在上千年的门阀士族制度至此画上了句号。



昔时白马驿,今日善堂镇迎阳铺。